

中国历代移民大势及其对汉语方言地理的影响

周振鹤

(复旦大学)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汉民族迁徙的大势及其与方言发展演化的关系,论述了历代移民及其对汉语方言地理的影响。首先,从先周时代到西晋末年几次重要的南向移民行动产生了南方各方言的最初渊源;其次,西晋末年以后由北面的三次汉族人民迁移决定了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第三,元代以后的东西向移民以及清代以来对东北和台湾的移民对汉语方言地理作了重要的补充。

关键词 中国 历代移民 方言地理 影响

中国历代移民活动对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地理分布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一点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注意。不过直到目前为止,对于移民和语言关系的研究工作做得还很不够。除了其他原因以外,重要的一条是移民史本身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人口迁徙活动,但是历史文献对此从不予以重视,哪怕是规模很大的移民过程,有时也只留下极为简略零星的记载,造成了深入研究的困难。本文将在前人和自己对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迁徙的大势,及其与汉语方言发展演化的关系,以就正于方家。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上溯先秦,下及近世,代代不绝。人口迁移的方式大别之有两类,一是人民自动的流徙,一是政府有计划的移民。前者多由于战乱、灾荒、饥馑或人口膨胀所引起,后者则是为了某种政治、军事或经济上的目的。纵观历史上所有的移民活动,其迁徙大方向主要是由北而南,其次是由东到西,反向而行的例子则比较少,这一重要地理特点产生了汉语南方各方言的最初源头,并形成今天汉语方言地理的格局。

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自然是古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及其身后汉族所用语言,经过数千年长期发展受周围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直接结果,而分布在中国南方的汉语其他方言溯其源则发端于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几次南下移民活动。

在南方吴、湘、粤、闽、赣、客六大方言中,要数吴方言的源头最为久远。据《史记·吴大伯世家》记载,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为了让贤于其弟季历(周文王之父)而避地至今江苏无锡一带。这个记载暗示三千年前的先周时代,在经过一场政治变动后,有一支移民从陕西渭水流域迁到江南太湖流域。这支移民的文化比当地的荆蛮文化要高,所以太伯、仲雍

成了新居地的首领，建立了吴国。移民们所带来的语言可能成为后来吴方言的最早渊源。

比吴方言稍晚的是湘方言。湘方言来源于今天已不存在的古代楚语。操古楚语的楚族本来居住在中原，一说在楚丘（河南濮阳西南）一带，一说以鄢（许昌东北）为中心。在殷末中原动乱的时候，楚人由其首领鬻熊率领南迁至江汉流域，因此楚语被带到了湖北地区。战国时期，楚国南进占有湘资流域，古楚语又扩散到湖南，成为湘方言的源头

战国时期结束，秦代一统海内，并且南逾五岭取得两广地区。岭南原是百越民族居住地，为了防止他们的反抗，秦始皇派遣五十万军队戍守于地。这些戍卒所用的语言，成今日的粤方言的先声。

福建本是闽越族的家园。西汉在此仅设一县以管理闽越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大量北来移民从陆路和海路进入福建，于是从建安年间到西晋初年的八十年中，福建西北山地和东部接连出现十三个新县，原始闽语应即萌发于这一时期。

赣、客语的出现最晚。江西地区古称吴头楚尾，应当是古吴语和楚语的交汇处，因此汉代以前没有原始赣语的痕迹可寻，杨雄《方言》在江西也独留下空白。在西晋永嘉以后发生的汉族人民大南徙的浪潮中，有部分北来移民达江西东部，他们带来的语言可以看成是赣、客语的最早前身。

上述所谓各方言的渊源，当然是指从历史文献方面所能追溯到的最早源头，并非说当时已经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南方方言。现代汉语南方各方言是在上述渊源的基础上，经过千百年来多次移民活动所带来的新方言的不断冲击·发生取代、交融、渗透、混合而向前发展演化的结果。因此除了提及与方言渊源有关的移民外，更重要的是分析与现代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有关的重大移民过程。

二

今天南方地区的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大致如下：吴方言在苏南（除镇江以西）浙江地区、湘方言在湖南湘资流域及广西东北角，粤方言在广东中部、西部和广西东南部，闽方言在福建（除闽西），粤东南和台湾大部，赣方言在江西北、中部、客方言在赣南、粤东北，闽西及川、桂、台部分地区，北方方言中的下江官话在苏皖二省的江北地区（除徐州、蚌埠一带），西南官话在湖北（除东南角）、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桂西北、河南南缘。

本文所说的南方，在大多数场合下指的是淮水秦岭一线以南地区，而不专指江南。秦淮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界，在中国移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汉人三次大南徙大致是此线以北即中原地区的人民迁至此线以南，元代以后从东到西的迁徙活动也主要是从此线以南的东部迁到此线以南的西部。与移民史相对应，在方言地理上，秦淮一线自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晋代以前，此线或许可以看成是南北方言的大致分野，西晋以后发生的三次南下大移民才使北方方言大规模越过此线进入南方，从而逐渐改变了南方方言地理的布局。

第一次汉人移民大浪潮发生在西晋永嘉以后至南朝宋泰始年间。由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入侵，因此而压迫中原大量汉人向南流徙，在永嘉元年至泰始二年（307～466）的一百五十年间，从河北、山西、陕西及淮水以北的河南、江苏、安徽和黄河以北的山东等地，向南方拥来的流民达九十万人之众。这个数目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又占到南朝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换句话说，北方每八人就有一人南迁，而迁徙的

结果，又使南方人口中每六人就有一人是北方侨民。

这么大量目的移民并不是均衡地分散到南方各地去，而是集中分布在淮水（在山东是河水）以南至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北地区及秦岭以南至四川成都之间。具体而言，在北方偏东部的河北、山东（黄河以北）人民侨寓在黄河以南的山东地区，黄河以南的山东、苏北（及部分河北、皖北）移民则更往南迁至江北扬州、淮阴及江南南京、镇江、常州一带；同时淮水以北的河南、安徽（及部分河北、苏北）移民则流向淮水以南，或更进一步到鄂东、皖南芜湖、九西九江一带。

在北方偏西的山西及部分河南移民迁到湖北江陵、松滋、湖南安乡一带，陕西及豫西北流民则侨寓于以襄阳为中心的鄂豫两省的汉水流域，而甘肃、陕北人民主要流向陕南汉中及通向成都的川陕通道上。

更进一步而言，上述地域中，有些区段的侨民呈高度集中状态。例如健康（今南京）是东晋南朝的首都，自然聚集以洛阳为主的大量北方衣冠士族，而南京以东的镇江一带，也竟有北方侨民二十二万余，占到江苏全省侨民的十分之九，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多。由于迁徙时间集中，侨寓地区集中，而且侨民的居住方式往往是聚族而居，不杂土著，在这种情况下，侨民所带来的北方语言必然要对土著语言发生深刻影响。我们可以想象，在江淮之间，当时的北方方言已取得优势，在南京、镇江一带，北方方言恐怕已与当地原有的吴方言颀颀奠定了今天下江官话的最初基础。当时北方侨民语言和吴语的巨大差异在《世说新语》和《颜氏家训》等书中有很生动的描写。唐代人士也注意到这种由于移民活动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现象，诗人张籍的《永嘉行》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所谓“晋语”显然指的就是晋代北方移民带来的语言。在湖北地区，北方的“晋语”必然也对楚语发生冲击，而产生西南官话的最初端倪。

因为东晋南朝采用侨置郡县的办法安顿北方流民，因此从侨州郡县的名目和所领户籍数可以推知侨民的原籍和大致人数，从而对西晋永嘉以后的第一次移民情形才得以有比较详尽的了解。但是研究后来的两次大移民都没有这个便利条件，因此情形也就暗昧得多，以至于中唐安史之乱引起的汉族人民的第二次南徙，就几乎没有人提到过。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历时八载，战祸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这次叛乱还带上点民族斗争的色彩，并且由此向南蔓延，所以再度引起中原地区（在唐是河北、河东、关中、河南四道）人民的向南流徙。

《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荆南并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中原多故指的正是安史之乱，至德元年即安史之乱的第二年。这一记载表明安史之乱不但不的确引起北方人民（包括长安洛阳的士族和鄂北豫南的百姓）的南迁，而且移民规模很大，致使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一带的户口增加了十倍，并因而设立荆南节度使辖区；同时移民的迁徙路程也比一次大移民走得更远，到达洞庭湖以南的湘水流域。

北方移民不但到达洞庭湖流域，在东部还到达太湖流域。《旧唐书·权德舆传》载：“两市蹂躏於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大约由於江东人口的增加，所以至德二年分润州（今镇江）置昇州（今南京），几年以后，又分宣州置池州。

在南方中路的江南，更有大量北方移民的到来，这一点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安史之乱前后户口的对比看来，却十分明显。

唐代后期发书的《元和郡县图志》保留了唐代相当一部分州府在开元年间（731～741

年，下距安史之乱14年）和元和时期（806～820年，上距安史之乱43年）的户数。从全国范围看来，由于中唐以后地方豪强隐占户口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元和时期各地户数比开元时期普遍下降，其绝对数不全可信（实际数也许要多上近一倍）^①，但从相对数来看，却很可能说明问题。

北方各州户数元和时期是锐减状态，普遍不足或只有开元时期的五分之一（实际上也许没有这么低），说明战争破坏的严重。相对而言，南方大部分州府户数减少得不太多（也许实际上不减），部分州府基本不减（实际是增），有些州府则有所增加（实际大增），个别州府甚至大幅度增加（实际激增），这个情况暗示了南方有些州府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北方的移民。

江西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户数增加最为突出，其中最异常的是位于赣东北信江、鄱江流域的饶州。该州户数净增四倍之多，从一万四千户（江西六州中最低）激增至七万户左右，並因此分置一个新州——信州。稍次是赣江下游的洪州、净增三分之二，再次是赣江中游的吉州，增五分之一，洪州以南的抚州户数则基本不减（说明实际上也有所增加）。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江西北部和中部在安史之乱以后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所谓客家的先民，当以此次移民运动最为重要，可惜这一点未被那怕一位研究客家源流的学者所留意。江西在中唐接受大量移民后，经济上加速发展，以至人口增加很快，五代时已向湖南输出移民（详后）。江西而外，由襄州（今襄樊）沿汉水南下经郢（今钟祥）、复（天门）至鄂（武昌），诸州户口却有不同程度增加，移民路线斑斑可辨。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引起的移民运动规模不小。移民比较集中的新居地主要是襄阳、江陵、武昌之间的湖北腹心地区，湖南西北角、苏皖二省南部以及江西的北部和中部。而且这次移民走得比上次移民要远，已经到达洞庭湖、鄱阳湖以南，其前锋甚至到达岭南和福建。这种情况使北方方言再次对南方方言发生冲击，而且对南方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在湖北加速了北方方言对湖北方言的同化作用，奠定了这一地区西南官话的基础。江陵至常德一带由于移民对土著人口的压倒优势，当地固有方言或许已被移民方言取代；更往南，长沙衡阳一带的湘语受到北方方言的侵蚀，而消弱了其固有特征，新湘语的最初萌芽大约在此时出现。同时，粤方言也受到了移民方言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江西北、中部，北部移民带来的语言形成了今日赣语的主要基础，並为日后客家话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进入江西的移民语言像楔子一样，把吴语区和湘语区永远分隔开来，並且把闽语限制在福建地区。因此可以说，今日南方方言地理的雏形在中唐以后即已出现。此外江淮和江南地区也要受到一些移民语言的影响，但程度比较浅一些。

有些学者未注意到安史之乱引起的大移民，却误认唐末黄巢起义造成了汉人由北到南的一次大迁徙，其实这个看法没有足够的证据。黄巢起义军的最大特点是流动作战，方向飘忽不定，两年内南下北上数十省，不可能引起北方人民大规模由北到南定向地迁徙，至多只能迫使人们就近分散避乱而已。但是这一特点却对客家方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引起部分江西北、中部人民进入闽西和赣南山区，使这部分人的语言与北方方言区相隔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今天他们的后裔保留了较多的中唐以前北方方言的特征。

在移民的影响之外，还必须着重提到的是：从中唐以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到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历时达二百年，对方言地理的形成起了强化的作用。也就是说，北方移民对南方不同地区的方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地区差异性又由于各地人民长期生活在各自

为政的分裂局面当中而更形加强。吴越，吴（南唐）、楚、闽、南汉等及其前身的各有关节度使辖区对促进吴、赣、湘、闽、粤方言区的形成显然有不少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统一后的宋代。^③

第三次中原汉族人民的大规模南迁发生在北宋靖康年间到宋末蒙兀的南侵，大约也历时一百五十年左右。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二年（1126～1142年）之间的移民活动。这次移民的原因和西晋末年一样，由外族入侵所引起；南下的路线和方法也和第一、二次移民相近似。但是有关的历史记载十分零散，这次移民的详情不免有一定程度的模糊，因此只能作一基本轮廓的描述。

具体而言，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接受了北方最大量的移民。南宋临时首都由扬州而建康，最终定于杭州，因此两浙路（今苏南浙江）自然吸引众多的北方士族和百姓。以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四方人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又说：“平江（苏州）、常、润、湖、杭、明（宁波）、越（绍兴）号为士大夫渊藪，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其中当然以临安（杭州）城里的北方移民最为高度集中，其成份是以开封为主的北方各地的人物，从文官武将直至僧尼商贾，在在皆是。

江淮一带在北宋末年本来集中了许多北方移民，濠州（凤阳）与中唐时一样，成为移民者的乐土，但南宋初年金兵南侵之后，这些移民又流向江浙地区。

江西的情况比较暗昧，只能推测有相当一部分河南人及部分河北、山东人移入。但值得注意的是金兵曾经由湖北南侵至江西中部，必然迫使一部分北来移民进入赣南以至粤北。

西湖地区依然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虽然湖北地近宋金边陲，本地人口向南迁徙，但同时它也容纳了更北的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的移民。湖南常德地区则再次接受大量移民，如《夷坚志》所载：“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南寓武陵（常德）。”同时，又有部分移民更往南行，到达湘水流域。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次移民比第二次移民更加深入南方。福建、广东、广西都接受了一定数量的移民。其中广西尤为突出，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比北宋元年（1080年）的户数竞争加一倍，为各路中增加最多者，暗示广南西路确有相当数量移民进入。^④

两宋之际的移民情形大体如此。其特点是除了江浙一带外，移民的分布较均衡，因此对南方方言的影响从总的方面来看不如第一、第二次大。最显著的影响在苏南浙北，使苏州和杭州都一度出现苏音与北音，杭音与北音对立并存的现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苏州的北音已经消融，但杭州的北音显然顽强保留着。故明代郎阴瑛的《七修类稿》说：“（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开封）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今天杭州市区的方言依然带有明显的北方味，然而一出杭州则仍是纯粹吴语的天下。江浙地区的北方移民最多，其影响不过如此，其他地区的北方移民至多也仅是加强第二次移民所形成的方言地理特征而已，不可能发生方言的取代作用。

江淮地区是北来移民的中继站，湖南常德再次接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南京，尤其是镇江相对集中数量较大的移民^⑤，这些地区此时应已成为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区。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客家方言的逐渐形成。由于两宋之际和宋末金人与蒙古人的两次南侵引起中唐以后迁到江南的大批北方移民后裔及唐末迁到闽西、赣南的人民再度迁移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区，这一带地理环境的闭塞，使移民方言终于与北方方言完全隔开，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方言，而且使梅县一带成为客家方言的核心地区。

元代以前中国最主要的移民活动就是上述的三次北南方向的大迁徙，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移民不再出现，转而发生由东到西的移民浪潮。

在东西向移民运动中，首先要提到的是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这一移民过程从五代开始，直到明清之际，持续七、八百年之久。

移民的原因是自发的经济要求。江西赣江中下游地区由于中唐以后接受了大量移民，开发程度比湖南高，到唐末五代在河谷地带已经人满土满，于是逐步向西邻的湖南地区转移以解决生计问题。所以《宋史·地理志》说：“而（荆湖）南路有袁（江西宜春）、吉（吉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溉种，率自富饶。”这一移民活动由宋至元渐具规模至明代而大盛，移民的结果使得湘东地区的百姓几乎尽为江西原籍，甚至僻在湘西也有江西移民的足迹。这种情况自然使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程度不同的赣语特征。

其次要提的是东部各省向西南地区——即四川和云贵地区的移民。

四川人口在历史上经过几起几落的大变化。今日四川人大部分是清代以后移民的子孙，少部分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裔，元代以前的土著则是凤毛麟角，所以明初移民后代早已被当成土著。元代末年，湖北地区发生红巾军起义，不少人避乱或随红巾军入川，因此入川之湖北尤其是麻城人最多。明初政府对四川进行移民，也以湖北籍人为主。明末清初，四川经受二、三十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破坏，元气大伤，人口大减，以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川的在册户口数还不足二万丁（丁略当户计）。于是清政府采用军屯，招集外省人口，勒令川人还籍等方法，积极向四川移民，使得四川人口在不到四十年时间内剧增到五十七万户。外省入川的移民以明代湖广（两湖地区）籍人为大多数，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加上本来所谓四川土著也主要来自湖北，因此今日四川方言实际上是两湖地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移的结果，虽然在民国初年四川有些地方的方言由于移民原籍的复杂还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但通行的已是以两湖的西南官话为渊源的四川官话。

云南地区自从唐代中叶南诏独立以后，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内处于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外。到元代初年重新统治云南以前，这里已经没有汉语的地位。元明两代及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据研究，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达百万之多。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明初名将沐英的军屯。今天西南地区留下的带有屯、堡、旗、营等字的地名就是当时军屯的遗迹。虽然进入云贵的移民籍贯十分复杂，但其中明代从南京（今江苏安徽二省）来的军人，地位相对重要，加上明太祖在军屯之外还迁徙富民大姓到云南，因此使得十七世纪初的昆明地区在风俗习惯、方言、衣着方面都与下江地区十分相似，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在昆明话中发现与南京话相似的成份。

清代中期在四川人口逐渐增加以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来到云贵地区，他们的籍贯比较单纯，主要来自江西和湖南，其次是四川，总人数在二百五十万左右。

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有些地区甚至带有下江官话的特征。

东西向移民值得一提的还有迁往汉水上游陕南地区的一支。该地区处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清代以前一直是人口稀少的地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人口不过十五万人多，平均每平方公里才二人。康乾之际开始有流民进入此地，乾隆以后蜂拥而至，以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时人口已达三百五十万之多，百年之间人口增加二十来倍，可见移民数量之巨。

移民原籍以四川、湖北二省为主，因此这里的语言自然与川、楚通行的西南官话相近。也因此今天陕南地区的群众喜爱汉剧（以武汉为代表）的程度胜过秦腔（以西安为中心）。

四

与北南方向和东西方向相反的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但在清代后却有很重要的两次，一次是清朝康熙以后由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另一次则是清朝后期以至现代由关内向东北的迁徙。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入清朝版图。此后海禁遂开，福建及广东人民开始向台湾移民。到1811年时，台湾人口除土著少数民族外已有一百九十万，四分之三世纪以后更达到二百二十万人之众。这些移民主要是来自闽南沿海的福佬人和来自粤东山地的客家人，这些的比例在日本占领初期是四比一，这就是今日台湾方言以闽南方言为主，并杂以客家方言的原因。

东北地区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康熙以后辟为禁区，不准移民出关。其实在这之前很少有汉民移居关外，东北一直地广人稀。倒是在禁令发布以后的年代，由于灾荒和饥馑，不断有流民潜入东北。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刺激清政府移民以实边，东北于是逐步开放，人口迅猛增加。据估计1904年时，东北总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但东北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还是在本世纪前期，到得1930年，东北人口已增加到三千四百三十万，与1904年相比，四分之一世纪中翻了一番。因此东北方言是语言大面积移转的典型例子。这里不发生移民与土著语言相互取代或融合的问题，而纯粹只是占据和填补，由河北和山东方言去填补东北的空地。今天在辽宁省可以观察到的辽东和辽西方言的差异，大致就反映了山东与河北方言的分歧。而且也反映了山东移民渡海进入辽东半岛和河北移民出山海关进入辽西的历史事实。

最后还要附代提一下后期客家人的多方向分散移民活动。宋末以来，在闽、粤、赣交界山地长期生息的客家人由于人口膨胀产生的压力，到明末清初以后，不得不向外迁徙，以求发展，他们或向东渡海到达台湾，或向西迁移，一路到达湘赣交界诸县，远者更到达四川，又一路到广东西南沿海、远者进入广西，因此在这些地区造成了许多客家方言岛和方言小区。

注释

①《唐要会》卷85《定户等第》记载：“元和六年正月，衡州刺史吕温奏，当州旧额一万八千四百七……臣到后，因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说明衡州户口隐匿不报之数约与名义户口相当。又从建中年间定两税户到元和间正是二十多年，很可能《元和郡县图志》中元和时期的户数实际上是建中年间的旧额。建中元年上距安史之乱只有十来，与开元时期户数相比较就更有意义。

②元和时期衡州实际户数至少有三万四千多（参见注①），比开元时期增加一点五倍。

③宋代一级行政区划“路”的划分沿袭唐后期方镇的大势而有所改进，更加符合人文地理实际，因此今天方言地理与宋代行政地理有不少相合之处。

④元丰三年户数据《文献通考》卷11，绍兴三十二年户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69》，不同出一书，但可供参考。

⑤镇江于绍兴二年，淮、汉人民来归者不绝，十一年海州人民又举州迁来。

日本大学地理系的人文地理学教育

——兼论我国师范院校地理系教学改革的迫切性

张 文 奎

东北师大地理系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在日本大学的实际考察情况,分析了日本大学的地理学的论点设计状况,并且与我国师范大学地理系课程设计进行了比较,揭示我国师范大学地理系课程设计的弊端;并对我国师范大学地理系的课程设计及教学计划的改变提出了参考性的意见。

随着地理科学的人文化、行为化、社会化与生态化,国外大学地理教育特别重视人文地理学的教育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人文地理学在社会实践方面——区域规划,厂址选择、开发设计等等,取得重大成效,人文地理学毕业生就职机会的扩大,使得人文地理学的教育工作更加蓬勃发展,不继扩充。

1985年笔者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筑波大学、关西大学、冈山大学、爱知大学、奈良女子大学等地理系,所见人文地理学教育状况,令人信服地承认,人文地理学是日日本大学地理教育的主导科目。这种状况和我国大学地理系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有根本不同。我国是吸收苏联50年代教学计划的成果,把大学地理系办成自然地理专业,尤其是令人费解的是师范院校地理系的教学计划也完全走自然地理专业的道路。把普通自然地理学的各分支全都独立出来设课,土壤地理,地质学、地貌学、气象气候学、水文学、植物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等主要者每门都达100多学时,把属于人文地理学范畴的经济地理学导论和中国和外国经济地理学三门课程压缩又压,合起来158学时,占师范院校地理系专业课程的(14.8%)而且有的地理系,把这三门课进一步压缩至100学时左右。这样既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地理学全部知识,尤其是不能掌握人文地理学最新发展的知识。也不利于地理系毕业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工作。有鉴于此,笔者简单介绍日本大学地理系课程设置和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情况,可供有关领导和同志们参考。

一、人文地理学是全体大学生的基础课程

日本大学教育分两个阶段(筑波大学除外)1~2年级为教养阶段,学生全部在教养部接受基础教育,上有关文、理科目的教育。人文地理学是所有学生必修的课目,占4个学分。

参 考 文 献

- 谭其骧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
谭其骧 湖南人由来考《方志月刊》1933·9
张家驹 宋代经济中心的南移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胡昭曦 “张献忠屠”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集刊》第一辑。
孙达人 川楚豫皖流民与陕南经济的盛衰《中国农民战争史集刊》第三辑。